

# 妇人郁证古文献考略

贾亦非 裴 丽

(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)

**摘要** 汉代以前《黄帝内经》中已有情志抑郁引起妇科疾病的记载;东汉张仲景首次对郁病进行了辨证论治,记载了属于妇人郁证的脏躁、梅核气之病名;宋金元时期,气血学说为后世妇人郁证搭建起了理论框架,妇科疾病从郁论治的范围大大扩展;明清时期明确提出“妇人多郁”观点,被后世医家普遍认可和临证应用。通过系统梳理历代古医籍有关妇人郁证文献,揭示其历史发展特征,研究古代医家对妇人郁证的认识规律,为现代临床治疗提供文献研究基础。

**关键词** 郁证;病因病机;中医药疗法;历史;女性

**中图分类号** R277.794 **文献标志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2-397X(2021)03-0072-04

**基金项目** 2017年度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(2017 A010)

郁证是对情绪积聚于内不畅、滞而不通、气机郁结而产生的一系列证候总结归纳后采用的病变名称,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凡是外感六淫或情志怫郁引起人体气血、脏腑功能郁滞不能通畅均可认为是郁证;而狭义郁证指情志异常变化刺激导致的气血津液运行紊乱。现代《中医内科学》<sup>[1]</sup>定义为:郁证是以心情抑郁、情绪不宁,胸部满闷、胸胁胀痛,或易怒喜哭,或咽中如有异物梗阻等症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病证。

本病临床甚为常见,以女性患者居多。据郁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女性与男性郁证患病比为2.8:1。古代女子郁证高发与女性生理特点、性格特点和社会地位关系密切:一是女子多气而少血,生理上常处于气有余而血不足的状态,气有余则易发郁遏,气郁则血滞,丹溪曰:“气血冲和,百病不生,一有怫郁,诸病生焉”<sup>[2]</sup>,故易生郁证。二是女子性情敏感,又处在封建父权的压迫中难以抒怀,明·方约之云:“妇人上有舅姑丈夫,事触物忤不能自决,而忧思忿怒沉郁于中”<sup>[3]</sup>,《医宗金鉴·妇科心法要诀》有言:“妇人从人,凡事不得专主,忧思、忿怒,郁气所伤”<sup>[4]</sup><sup>532</sup>,指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没有自主权,情感受到压抑,易产生疾患。因此,笔者系统梳理了古文献中历代医家对本病认识的发展脉络,以期为现代治疗该病提供文献参考与借鉴。

## 1 先秦至隋唐——“因郁致病”理论萌芽

这一时期,中医妇产科学还未形成系统的辨证论治体系,对妇产科疾病病因认识比较强调外因,但已有情志抑郁引起妇科疾病的记载,并且认识到女

性在一些特殊时期更容易发生情志疾病。《素问·痿论》指出悲哀太过,阳气内动而致血崩。经云:“悲哀太甚则胞络绝,胞络绝则阳气内动,发则心下崩,数溲血也”<sup>[5]</sup><sup>81</sup>。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<sup>[5]</sup><sup>14</sup>载:“二阳之病发心脾,有不得隐曲,女子不月。”明·武之望认为此句“隐曲”应从“隐情曲意”解,清·萧麋六亦认为“人有隐情曲意”<sup>[6]</sup><sup>14</sup>,女子内心难以抒怀,气郁不畅,忧愁思虑,或饮食不节,损伤心脾,生化无源,营阴暗耗,血海枯竭,乃至闭经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》记载淳于意诊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痛而经闭,指出病因是“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”<sup>[7]</sup>,认为此女过度压抑情欲,致使心情抑郁,气滞血瘀。

张仲景《金匮要略·妇人杂病脉证并治》中认为妇人杂病有三大病因,“因虚、积冷、结气”<sup>[8]</sup><sup>15</sup>,这是妇科中最早的病因学说,其中“结气”后世认为乃气机郁结,女子易受情志刺激而致病。该篇还首次对属于郁病的疾病作了辨证论治,记载了多发于女性的“脏躁”及“梅核气”两种病证,并拟“甘麦大枣汤”补脾气、养心神,“半夏厚朴汤”理肝气、散痰结。《金匮要略·妇人产后病脉证治》曰:“亡血复汗,寒多,故令郁冒”<sup>[8]</sup><sup>109</sup>,沿用了《黄帝内经》“郁冒”的病名,但并非气机郁滞的病机,而是妇女失血多汗,素多忧郁,气郁血结,阳脱于上,阴阳气血不能相交导致的晕厥。

隋·巢元方认为忧郁情绪是通过影响气机的调畅而导致月经失调的,深刻阐明了情志致病的内涵。《诸病源候论》<sup>[9]</sup><sup>178</sup>曰:“病忧恚泣哭,以令阴阳结气

不和,故令月水时少时多,内热苦渴,色恶,体肌枯,身重。”并且书中首次出现了“子烦”病名,记录其病机为“血饮停积”,或“虚热相搏”<sup>[91]</sup>。《产宝》曰:“气血停积,虚热相搏,气郁不舒,烦躁吐沫,剧则胎动不安,均为子烦也”<sup>[10]</sup>,并提出用“竹叶汤、麦门冬饮、紫苏饮、竹沥汤”治疗。朱丹溪亦云:“子烦由胎元壅郁,热气上冲,以致烦闷,法当清热疏郁以安胎。”<sup>[62]</sup>可见“子烦”属广义郁证范畴。唐·孙思邈也认识到女子情感丰沛,“嗜欲多于丈夫”,比男子更易七情内伤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<sup>[11]</sup>载:“(女子)感病倍于男子……染著坚牢,情不自抑,所以为病根深,疗之难瘥。”

先秦至隋唐,医家不断对妇产科学的病因病机进行探讨,将情志因素列为妇科疾病病因之一。张仲景首次记载了属于妇人郁证的脏躁、梅核气病名,所创制的甘麦大枣汤与半夏厚朴汤均沿用至今,妇人病三大病因学说被后世医家继承发扬,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“结气”因素。

## 2 宋金元时期——“从郁论治”范围扩大

宋代妇产科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,重视女性生理病理特点,为后世妇人郁证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,《圣济总录》<sup>[12]</sup>曰:“妇人纯阴,以血为本,以气为用。”气血是妇人经、带、胎、产各个生理过程的物质基础,气血调和则百病不生,反之若受外邪或情志抑郁致使气机不畅,发为郁证,则会影响血的运行生成,产生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。宋·严用和“妇人门”下专立“血气论治”,表明妇人“血气为患尤甚”<sup>[13]</sup>,血随气行,气一壅滞则血亦运行不畅,易引起月经不调、痛经、崩漏等妇科疾病。

这一时期,部分疾病病因从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化。如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认为月经不通、月经不利、闭经、乳房结核等等都与风冷阻滞经气有关,而宋·陈自明认为郁怒伤肝,导致气血不调,脏腑失和,损伤冲任而发为乳岩,在《妇人大全良方》详细描述了乳岩的生长特点,并提出乳岩初期,可内服中药治疗,方可用“益气养荣汤、加味逍遥、加味归脾”<sup>[14]</sup><sup>[65]</sup>;论及闭经时,认为室女积想在心,思虑过当,损伤心神,“心伤则血逆竭……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闭也”<sup>[14]</sup><sup>[22]</sup>;陈素庵认为“妇人经水不调,多因气郁所致”<sup>[15]</sup><sup>[5]</sup>,甚至“一有郁结,则诸经受伤……久则闭绝不行”<sup>[15]</sup><sup>[17]</sup>。因此,“治宜开郁行气,则血随气行……”<sup>[15]</sup><sup>[5]</sup>,体现在除养血药物外,还酌情添加香附、青皮、乌药之属以行气开郁。陈素庵还从“郁”出发对胎燥、妊娠吐酸、经闭成癥的证因治疗做了探讨。

金元时期各医家学派空前活跃,对于妇人郁证的治疗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,为后世医家所继承。朱丹溪将郁的概念推广到气、血、痰、湿、热、食六者,

并提出了“乳房,阳明所经;乳头,厥阴所属”<sup>[16]</sup>的著名论断,指出女子若受到家庭的压迫,情志内伤,忧思郁怒,会导致乳岩的发生,奠定了后世认识治疗该病的基础,如薛立斋认为“乳岩乃七情所伤”,武叔卿亦有“乳岩之病,大都生于郁气”之论。张子和认为除个别天生无乳者外,妇女产后乳汁不下可与自身情志不舒有关。肝郁气滞,乳汁运行受阻,可用精猪肉、猪蹄做汤,食之可治。《儒门事亲》<sup>[7]</sup>曰:“或因啼哭、悲怒郁结,气溢闭塞,以致乳脉不行。”

宋代气血学说的建立,为后世妇人郁证搭建起了理论框架,而医籍中与“郁”相关的妇科疾病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充,一部分疾病病因由外因论转向内因论,且此时论“郁”以探讨“气郁”居多。

## 3 明清时期——“妇人多郁”认知广泛

明清时期十分重视对妇产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分析,同时,随着郁证概念的发展与完善,医家越来越注重情志因素对妇科疾病的影响,因此,在分析病因时,更注重内因,诸多医家均已认识到妇人易患郁证。薛己《女科撮要》<sup>[18]</sup>曰:“苟或七情内伤,六淫外侵,饮食失节,起居失宜,脾胃虚损,心火妄动,则月经不调矣”,认为怒、郁、悲、恐等情志不调,容易导致各种妇产科疾病发病。万全认为“妇人经候不调有三”<sup>[19]</sup>,其中“脾虚”乃“忧愁思虑则伤心,心气受伤,脾气失养,郁结不通”,脾胃虚弱,则引起“血枯、经闭及血少、色淡、过期始行、数月一行之病”。张介宾将情志按照与郁的关系不同归为三类——怒郁、思郁、忧郁,其中思郁会导致女子崩漏、闭经,“其在女子,必得愿遂而后释,或以怒胜思,亦可暂解”<sup>[20]</sup>。陈士铎《辨症录·卷之四·五郁门》<sup>[21]</sup>曰:“人之郁病,妇女最多。”陈修园更是直接提出“妇人之病,多起于郁”<sup>[22]</sup>。

在对妇人郁证进行治疗时,明清医家多从肝论治。赵献可推崇《内经》治郁五法,强调郁病以木郁为本,更有“凡郁皆肝病也”之说,并提出了“以一法代五法”的治郁观点。《医贯》<sup>[23]</sup>曰:“予以一方治其木郁,而诸郁皆因而愈。一方曰何?逍遥散是也。”李梴认为古代妇女行事多听从他人,不得专行,因此情志上多忧思忿怒,机体气血郁结。他善用香附行气开郁,在其整个医论中就用将近四十次之多。《医学入门》<sup>[24]</sup>曰:“女病皆因气血郁结,所以古方多用香附、砂仁、木香、槟榔、青皮、枳壳者,行气故也。”林佩琴《类证治裁·调经论治》<sup>[25]</sup>曰:“盖妇女善郁,木失条畅,枝叶萎悴,肝不藏血,经之所由不调也”;张景焘《鹄塘医话》曰:“妇人善怀而多郁,又性喜褊隘,故肝病尤多。肝经一病,则月事不调,艰于孕育”<sup>[26]</sup>;《胎产新书》载:“大抵妇人,情多执拗,偏僻忿怒妒忌,多伤肝气”<sup>[27]</sup>。

清·傅山尤其重视“肝郁”，所著《傅青主女科》一书中有关妇科疾病病因、病机、治疗从肝论述较多。纵观全书，与肝有关的条文占总条文三分之一，从肝论治的方剂约 20 首。如他将带下分为五色，其中“白带”乃“湿盛而火衰，肝郁而气弱，则脾土受伤，湿土之气下陷”<sup>[281]</sup>，“赤带”乃“妇人忧思伤脾，又加郁怒伤肝，於是肝经之郁火内焙”<sup>[282]</sup>；论述“不孕”时，认为嫉妒之不孕是由肝气郁结所致；认识到妇人产后，若遭到嫌弃责骂，羞愤成郁，会致两乳胀满疼痛，乳汁不通，宜大舒肝木，则乳通矣。傅氏治疗妇产科疾病多用舒肝解郁法，是其主要临证特点之一。例如：以宣郁通经汤治经前腹痛；以解郁汤治子悬；用开郁种玉汤疏肝解郁、调经种子，治疗不孕、经行胸乳小腹胀痛、情志抑郁。以上对叶天士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理论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由于对疾病认识的发展，原有的疾病概念内涵有了新的扩充。明清医家把脏躁列入胎产门，使该病的发病人群扩展到了妊娠期的女性。王肯堂《证治准绳·女科》<sup>[29]</sup>记录了用“甘麦大枣汤”治一妊娠脏躁医案，其曰：“妊娠四五个，脏躁悲伤，遇昼则惨凄泪下，数欠，象若神灵，如有所凭。医与巫皆无益，与仲景大枣汤，一投而愈。”薛己治疗脏躁除用仲景大枣汤外，首以淡竹茹汤为主，佐以八珍汤。清·闵纯玺在《胎产心法》中认为此是“发前人之所未发”。明·龚居中首次将乳癖与乳房肿块联系在一起，而陈实功《外科正宗》对乳癖的临床特征和病因病机进行了详细描述，认为“乳癖多由思虑伤脾，怒恼伤肝，郁结而成也”<sup>[30]</sup>。此后医家也大多认为情志抑郁，易损伤五脏之肝，气机不畅，乳房胃络所过之经脉阻塞不通，气、痰、瘀结聚成块而发本病。如《罗氏会约医镜·乳病门》<sup>[31]</sup>曰：“大凡乳证，因恚怒者……”《医宗金鉴》<sup>[4800]</sup>记载：“乳中结核梅李形……症由肝脾郁结成。”

此外，明清医家还注意到孀妇、僧尼、婢妾这些女性易发郁证，如：《万式女科》认为此类妇女易发生经闭，云：“愆期未嫁之女，偏房失宠之妾，寡居之妇，庵院之尼，欲动而不能得遂，憾愤而不能得伸，多有经闭之疾”<sup>[19]10</sup>；武之望《济阴纲目》<sup>[32]</sup>曰：“凡婢妾素见忌于嫡室者，必多抑郁，以致经水不调”，可用十全济阴丸加制香附二两治疗；清《竹林寺女科》<sup>[33]</sup>曰：“室女妬妾，寡妇师尼，独阴无阳，欲动而不得遂，憾积而不得伸，郁抑成病，亦有经闭之症”，宜服柴胡疏肝汤兼四制乌附丸。

明清时期，医家在分析妇科疾病病因时更强调内因，逐渐形成了“妇人多郁”的观点，主张从“肝郁”角度进行治疗。

#### 4 结语

本文以古文献研究为视角，梳理了古代医家对妇人郁证的认识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到：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医家对郁证认识程度不同，对女性发生气机郁滞或情志抑郁等症的病因病机的理解也各不一致。先秦至隋唐，医家已认识到愁忧思虑等抑郁情绪易影响心神，从而导致闭经等妇科疾病，张仲景创立了专治妇人喜悲伤欲哭的“甘麦大枣汤”与“半夏厚朴汤”，后世更为强调妇人病三大病因中的“结气”因素。宋金元时期，妇产科学发展迅速，同时郁证理论的发展和创新，为妇产科疾病治疗提供了新的角度。明清时期，妇产科疾病概念不断丰富，脏躁发病人群已扩展到妊娠期妇女，众多医家对前代的各种理论充分继承与发挥，对郁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，越来越重视情志抑郁对女性健康的影响，治疗重心由“心神”逐渐转移到“肝”，《傅青主女科》中“疏肝解郁”思想以及叶天士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理论，对后世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由于妇人郁病症状繁多，其描述散见于各类医籍，这将给现代人们查找女性郁证资料带来困扰。因此，本文对妇人郁证古文献进行了考辨，通过梳理其历史发展特征，以期呈现古代医家对妇人郁证的认识规律，为现代临床治疗提供文献研究基础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周仲瑛, 主编. 中医内科学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85: 373.
- [2] 朱震亨. 丹溪心法[M]. 沈阳: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: 122.
- [3] 方广. 丹溪心法附余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5: 862.
- [4] 吴谦. 医宗金鉴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95.
- [5] 佚名.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周鸿飞, 范涛, 点校. 郑州: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.
- [6] 萧坝. 女科经纶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99.
- [7] 司马迁. 史记: 第5册[M].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5: 1245.
- [8] 张仲景. 金匱要略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6.
- [9] 巢元方. 诸病源候论[M]. 沈阳: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.
- [10] 叶其蓁. 女科指掌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6: 116.
- [11] 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[M]. 鲁兆麟, 主校. 沈阳: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: 14.
- [12] 赵佶. 圣济总录: 第8册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8: 3102.
- [13] 严用和. 重辑严氏济生方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7: 182.
- [14] 陈自明, 原著. 熊宗立, 补遗. 薛己, 校注. 《妇人良方》校注补遗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1.
- [15] 陈素庵, 著. 陈文昭, 补解. 陈素庵妇科补解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.
- [16] 朱震亨. 格致余论[M]. 天津: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0: 24.